观察

辽代建城潮奠定辽宁城镇千年版图

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



四面城城址俯瞰图。

在辽宁，不少城市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千年。辽阳、朝阳、锦州、北镇、开原、法库、阜新……今天这些城镇的位置和交通走向，很多在千年前的辽代就已定下雏形。辽朝在辽河流域掀起建城浪潮，又用南北面官制“因俗而治”，让游牧、农耕两种生产生活方式在同一个政权框架内共存发展。古城墙、墓志、壁画，记录下多民族共居共治的日常，也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，北方民族政权的独特创造。

制图 董昌秋

四面城城址是辽宁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古城。

四面城城址复原模型。

辽代城址遍辽宁

今年55岁的李兵，种地之余开车跑运输。他的货车涂装是闪亮的金色，这颜色既像家乡四面城城址一带流传的金高粱传说，也暗合他的另一个身份：辽代安州城残碑的发现者。四面城城址是辽宁保存最完整的辽代古城，夯土城墙绵延乡野。由此向西，朝阳老城区地下埋藏辽代兴中府故址；向南，辽阳老城，昔日东京辽阳府的街市轮廓，仍可从文献与考古遗存中依稀辨识。

铁岭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周向永汇总多年成果后发现：今天辽宁境内主要城镇，甚至农村主要村落，都能找到辽代遗存。辽朝统治辽东200多年间，在今天辽宁境内兴建改建了大批府、州、军、县城池。有继承前代的老城，也有为安置移民新建的城市；有京府、普通州县，也有头下军州。它们构成辽宁历史上第一次密度可观的城镇网络，不少城市延续发展，演变为今天的中心城镇。

辽阳是辽朝五京之一的东京辽阳府，也是辽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，城市分内城宫城和外城汉城。当时外城称汉城，汉人与其他农耕民族百姓在此商贸、农耕。朝廷派东京留守统辖辽东数十州县，管理赋税、民政；同时，不少契丹部族也在这驻牧。一个地方，同时存在州县管理和部族管控两种形态。

朝阳是辽代辽西重镇兴中府。这里出土了不少辽代汉人、契丹贵族墓志。墓志留下官吏任职履历，为了解辽朝地方行政提供了实物依据。北镇的显州、乾州，依托医巫闾山辽代帝陵兴建，承担陵寝管护和地方民政。锦州、银州（铁岭）、咸州（开原）等城池，安置大批掌握冶铁、纺织技艺的中原移民，当地手工业和农业同步发展。

最有辽代特色的是阜新、法库一带的头下军州。懿州（塔营子古城）、成州（红帽子古城）是代表。头下军州是契丹王公贵族设立的私城，安置战争俘获人口。节度使由朝廷任命，刺史以下由贵族自家部曲充任；赋税部分归头下主人，酒税上缴上京盐铁司。后来懿州“纳土归朝”，划入东京道州县序列，转为朝廷直接统辖的普通州城。这一变化，能看出辽朝地方行政建制的动态调整。

考古调查显示，辽宁境内辽代城市规模层级分明：京府大城周长二三十里，普通节度州城四五里，头下小城、县城周长一两里。这些夯土城址遍布辽西、辽东、辽北，勾勒出一幅辽代辽宁城镇分布图。后世很多州县，直接沿用辽代城址。辽宁现代城镇分布格局的基础由此奠定。

因俗而治抚民安农

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肖忠纯教授认为，辽河流域是辽朝城镇稠密地区，城镇数量远超前代，将其视作辽宁古代史上第三次建城高潮。辽朝能大规模建城，背后有一套开创性政治设计——南北面官制度。

这套制度说起来并不复杂：北面官主要由契丹贵族出任，按契丹部族旧俗管理契丹和游牧部族事务；南面官模仿中原官制，设三省六部、节度使、刺史、县令，主要治理农耕人口，掌管州县行政、赋税和农业生产。

辽代墓志显示，不少契丹贵族一身兼有北面、南面两套官衔。法库出土的《萧袍鲁墓志》中，墓主人官拜北面官北府宰相，同时兼任南面官体系节度使；朝阳出土的《耶律延宁墓志》中，墓主同时执掌北面部族军政和南面官宰相头衔。这说明南北两套体系不是完全隔绝的官员阵营，而是同一王朝之下的两套职事系统，人员可以交叉任职。

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，有非常现实的经济社会诉求。立国之初，大量中原汉人因战乱被俘或迁徙进入辽境。如果强行用草原部族制度管理农耕民众，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。南北面官制推行后，通过南面官管辖的州县、头下军州，为移民提供定居空间，鼓励汉人继续从事熟悉的农业生产。大量移民垦辟荒地，传播中原农耕、手工业技术，辽河流域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。昔日边地，呈现田野开辟、城郭相望的景象。

有学者提出，南北面官是辽朝中央层面的官制划分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并行两套平行地方行政体系；在地方，普通州县、部族建制交错并存。头下军州最典型：贵族拥有私城，体现契丹贵族特权；而州、县建制和赋税管理，又执行南面官州县制度。一旦私城上交朝廷，就彻底转变为普通州县，归入南面行政管辖。这种弹性与灵活性，是辽朝地方治理的独到之处。辽宁众多城址的兴废变迁，正是这一制度演变的见证。

文化交融的载体

考古人员在对阜新关山辽代萧氏家族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时，在萧和与秦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中发现大型出行仪仗彩色壁画。墓道南壁绘制14名幞头汉服汉官，北壁绘制14名髡发窄袖契丹人物，伴旗鼓仪仗图像，直观再现辽地各族官僚共处的时代图景。两组壁画与墓志文字记载相互印证。研究人员分析，南北面官制本质上是多民族王朝的治理创新：在同一个辽政权框架内，尊重游牧、农耕不同生产生活方式，不强制推行单一文化，让不同族群各安其业，由此促成文化汇流，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。

在辽代，辽地各族民众共居一城。东京辽阳府、兴中府，既有契丹贵族府邸，也有汉人的坊市。制度层面，北面官保留契丹部族传统；南面官承袭中原典章，推行儒学，开设科举，吸纳汉人参政。文化生活中，朝堂上，汉官穿汉服，契丹臣僚穿国服，各随其便；音乐、礼仪上，契丹国乐与中原雅乐、散乐并行，中原儒学与契丹本民族文化彼此交融，催生出独具特色的辽文化。

辽朝这套“因俗而治”的治理实践，是中华文明强大包容性的历史见证。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同一个政权内部实现制度兼容、经济互补。辽朝在这片土地上建起的一座座城镇，既是安置移民、发展生产的据点，也是文化交融的载体。汉人带来中原农耕、建筑、儒学文化，契丹保留草原制度与习俗，其他部族遗民传承本土技艺，多种文化在辽河流域碰撞、吸收、重塑。

辽代留下的不只有一座座古城遗址，更有一套城镇体系框架。金代基本继承辽代州县布局；元明两代，多数辽代州城继续沿用，城镇位置、交通网络大体沿袭辽代奠定的基础。今天辽宁很多城市的历史根脉，正植根于辽代这一波建城浪潮。

当我们行走在四面城城址，探访塔营子懿州残垣，品读墓志上各族官员的职衔，回望辽代南北面官制度，看到的不只是一套古代官制，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，北方民族政权作出的创造性贡献。

延展

移动的王朝

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

辽宁省博物馆“古代辽宁”辽金展厅里，“四时捺钵”动态投影动画展区，常常吸引不少孩子驻足观看。《辽史》载：“秋冬违寒，春夏避暑，随水草就畋渔，岁以为常。四时各有行在之所，谓之‘捺钵’。”捺钵是契丹语译音，指皇帝的行营。它不同于其他朝代帝王偶一为之的狩猎出巡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：庞大的官僚队伍跟随牙帐一同迁徙，军国要务，就在旷野毡帐之中决断。

辽朝立国200余年，契丹帝王常年四时巡狩。医巫闾山，便是这条巡狩之路上极为重要的一站。据史料记载，辽代七位帝王先后35次巡幸医巫闾山，前后历时188年。那些深埋地下的墓志、壁画、建筑残件，为我们从辽宁视角，还原捺钵制度的真实样貌。

独特的“行朝”体制

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凤岐提出，捺钵绝非单纯的游猎活动，而是辽朝独特的“行朝”体制。渔猎礼仪的外壳之下，承载着完整的国家统治功能。每一次迁徙，契丹各级臣僚、服役人员，以及汉人宣徽院下辖的各类机构人员大多随行。汉人枢密院、中书省只遴选少数官员扈从，其余官员留守中京，处理汉地日常行政事务。重要官员的任免，必须前往捺钵行在请旨核定。辽代的五京，更多属于象征性都城，真正的政治中心，是不断移动的捺钵行帐。春捺钵的头鹅宴、夏冬捺钵的南北臣僚集会、部族首领朝觐轮番上演，集军事、外交、礼仪、行政职能于一体。

辽宁虽没有辽帝四季固定的捺钵主营地，但医巫闾山特殊的地位，让这片土地深度嵌入辽帝巡狩体系。医巫闾山建有显陵、乾陵，安葬着辽世宗、辽景宗两位帝王。圣宗、兴宗、道宗等帝王，时常奔赴医巫闾山拜谒陵寝，在山间搭建临时牙帐，狩猎宴饮，接见宗室与勋贵大臣。《辽史》中，“幸医巫闾山”的记载屡见不鲜。不过，辽帝在医巫闾山的驻跸巡幸，并不完全等同于四时捺钵，只有部分时段的活动，沿用捺钵“行朝”的运行模式。

谁是随驾人

2012年至2018年，经过连续7年田野考古，我省考古工作者基本确定辽乾陵的方位。北镇市考古和文物保护服务中心依托遗址保护区内的考古工棚，打造了一处小型辽代文化展，展出当地出土的代表性辽代文物，耶律宗政、秦晋国妃萧氏等珍贵墓志就在其中。

《辽史》用文字勾勒出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，而辽宁出土的大量辽代墓志石刻，补足了正史语焉不详的诸多细节。省博物馆、北镇博物馆、阜新博物馆收藏的这批墓志，大多出土于医巫闾山周边、阜新关山、法库叶茂台等辽代贵族墓地。墓主人多为皇族、后族高官，世代追随帝王，奔走于春水秋山之间。

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庆介绍，为保障捺钵有序开展，辽朝专门设置了负责扈从安保、物资供给、仪驾典礼的各类职官。这些官职在《辽史·百官志》中不见记载，仅能从出土石刻中寻得线索。大量墓志反复出现“扈跸”“从幸”“随驾畋猎”“扈从巡狩”等记述，是辽宁留给捺钵研究最为珍贵的一手史料。北镇龙岗墓群出土的耶律宗政、耶律宗允墓志，记录两位宗室多次跟随辽帝来到医巫闾山，在行帐之中参与祭祀、朝会。阜新关山萧和家族墓志，记述后族萧和父子历经圣宗、兴宗两朝，常年扈从帝王参与四时捺钵。法库叶茂台萧义墓志记载，墓主人多次“扈从巡狩”，亲历捺钵全套礼仪流程。

品读石刻文字，捺钵“行朝”庞大的人员构成渐渐清晰。除南北面官体系中的朝廷重臣外，还有一整套专门服务于移动朝廷的职官队伍：随驾步军什将、随驾三军都虞候负责护卫安全；随驾内库都监、随驾丝绵库使掌管各类物资；随驾仪銮副使统筹礼仪仪仗；甚至还有管理行在集市的“随驾市巡都监”。这些扈从人员，是捺钵“行朝”得以运转的基石。张国庆认为，以往研读《辽史》，人们多看到皇帝渔猎议政的表象，却忽略支撑整套体系运转的庞大官僚与服务群体，辽宁出土石刻恰好补上了这一块历史拼图。医巫闾山周边出土墓志显示，不少墓主生前追随帝王辗转各地捺钵，身后归葬医巫闾山家族墓地。墓葬安在辽宁，一生足迹却遍布辽朝全境，这正是辽宁辽代遗存独有的价值。

医巫闾山新立辽代建筑遗址、琉璃寺遗址，经考古发掘，清理出大型廊院建筑基址、道路、瞭望设施，确认为辽代陵寝祭祀建筑。据《辽史》记载，辽帝谒陵期间会在医巫闾山一带驻留，设立临时行帐处置政务。

最鲜活的证据

辽宁出土的众多辽代文物，是还原捺钵生活图景的实物载体。法库叶茂台、阜新关山辽墓出土的鸡冠壶，模仿游牧民族的皮囊容器，便于车马迁徙途中储水、盛酒，正是捺钵“车马为家”物质生活的生动缩影。墓葬出土的狩猎纹玉带、铁箭镞、鸣镝，对应春捺钵捕鹅、秋捺钵射鹿的渔猎传统。

最鲜活的图像证据，来自辽墓壁画。萧和墓出土的《骆驼毡帐图》，绘有骆驼、大型毡帐、奚车，再现扈从贵族跟随帝王四时迁徙、搭建牙帐的场景。平原公主墓、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壁画，绘出骑射猎鹿、架鹰出行的画面。湖北大学教授万雄飞研究发现，凌源小喇嘛沟一号墓石棺板，同时镌刻“鹘捕鹅雁”春水图与骑马射鹿秋山图，海东青、扁鼓、奔鹿等元素，与《辽史》记载的春捺钵、秋捺钵活动一一对应，是难得的图像史料。

这些壁画、器物不是辽帝捺钵行宫遗物，而是在扈从捺钵的契丹贵族墓葬出土。当年无数跟随帝王纵马四方的贵族、官员，许多人死后归葬辽西故土。他们留下的墓葬、壁画、墓志，留存下捺钵制度的片片记忆。

不少研究者认为，辽代捺钵制度影响深远。四时捺钵并非辽朝独有的制度，这套巡狩理政的模式，深刻影响金、元两代；及至清代木兰秋狝、热河避暑理政，仍能窥见捺钵文化的历史余响。广泛分布在辽宁大地的辽代遗存，为今人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：透过扈从者的足迹，我们得以看清整套制度如何落地运行，读懂捺钵不只是帝王的游猎活动，更是牵动整个辽朝社会的国家大政。



辽庆陵壁画之四季山水图摹本局部。

